

金石方寸 师生情长

——萧殷与弘征 □陈家基

在河源市图书馆内萧殷文学馆的一个展柜，展出了萧殷生前使用过的文具，其中有12枚印章都是萧殷的学生和朋友为他篆刻的，其中有三枚为弘征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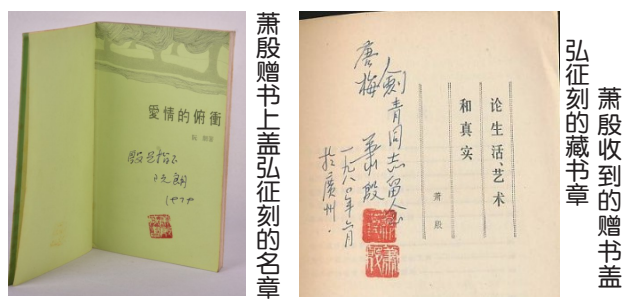
弘征，原名杨衡钟，湖南新化人，1955年毕业于株洲铁路机电学校。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室副主任、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芙蓉》杂志主编等。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以篆刻名世，并先后出版了《望岳楼印集》和《现代作家艺术家印集》等。

根据萧殷与弘征的通信，弘征曾经为萧殷刻过的印章至少有三枚。遗憾的是有三枚印章不知所踪，仅现存保存在萧殷文学馆的三枚（下图）。



萧殷所刻的各枚印章，弘征在2020年12月21日给萧殷女儿的信中有说明：“最初是1978年间，我重新燃起了少时曾刻过印的热情，就刻了一方‘萧殷’的小名章和‘萧殷藏书’的印请殷师指正。

因为我知道殷师年轻时学过美术，和赖少其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同学，殷师收到后很喜欢给予我许多鼓励，又命我刻了一方大点的名章和一方收藏印。那方名章我后来在出版《现代作家艺术家印集》时，放在书的第一面，边款上刻有‘殷师之命，弘征敬刊’。收藏印放在第二面。此外，殷师还命我刻过两方闲章，印文为‘未宜轻屈平生膝’，与‘不辞羸病卧残阳’。



弘征刻的藏书章 萧殷收到的赠书章 萧殷赠书时盖弘征刻的名章

“文革”前萧殷家中藏书非常丰富，原来有六大柜子书籍，其中有世界文学名著，包括薄伽丘的《十日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契科夫短篇小说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等200多册；中国文学名著包括《红楼梦》《水浒传》《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和《苦菜花》等30多册；俄罗斯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上百册；当代作家（友人）赠送的文学作品约50册，还有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摄影杂志、字帖、唱片。以及给女儿买的中外儿童文学书籍，如《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等。

“文革”开始，萧殷被批斗抄家。为了避免因为收藏的书籍被上纲上线，萧殷在1966年7月的一个晚上将家中珍贵的藏书在院子里付之一炬。广东作家黄秋耘在《焚书记》一文中记叙了萧殷焚书的情况：“还有一户焚书最多的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萧殷同志，他藏书甚多，是时职居中共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自然是‘重点户’。他几乎把所有的书全部烧光，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余烟袅袅，不绝如缕。”

六大书柜的珍贵藏书，最后只剩下一个上下四排的书柜大约四分之一的书。

“文革”过后，萧殷“复建书橱”，因此专门请弘征刻了藏书章。印章边款道出了萧殷请弘征刻这一款藏书章的缘由。如今，这些盖有萧殷名章和藏书章的藏书，全部由萧殷家属捐献给了萧殷文学馆。

藏书章“萧殷收藏” 尺寸：1.5cmx4cmx4cm 边款：殷师收藏之记 弘征敬刊

1996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弘征篆刻作品集《现代作家艺术家印集》。这本由刘禹粟题签、周谷城题端、费新我书额、钱君匋作序、秦牧写序的印集，收入弘征历年所刻的376方印章。

书中收录了两方闲章，第一方的文字出自宋代刘克庄的《满江红·和王实之韵送郑伯昌》的“只愿常留相见，未宜轻屈平生膝”；第二方的文字出自宋代诗人李纲的诗《病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名章“萧殷”（此印章不知所踪，故详细资料缺失） 闲章“未宜轻屈平生膝”与“不辞羸病卧残阳”（此两方印章不知所踪，故详细资料缺失）

左翼初心。

文化狂飙雄声隆

□俞宽宏

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来上海定居的北四川路这条半租界现代街区，是除南京路和福州路之外最为繁盛之地，“日夕车辆云集，行人拥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年，基于中共四大召开之后这里浓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氛围和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借助这块连接全球贸易的桥头堡，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大批左翼文化学者、作家和共产党人，把创造社和中华艺术大学迁移至北四川路底，在这里创建了太阳社、我们社、朝花社、艺术剧社、时代美术社和其后的野风画会，出版了大批左翼期刊、新兴社会科学著作和其他进步译著，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在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上演了一首壮怀越越的文化进军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衍最早从日本回来落脚北四川路。洪灵菲和戴平万9月从南洋流亡到上海，后辗转住进北四川路鸿庆坊，同林伯修等潮汕籍文化人在这里创办我们社。七一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钱杏邨和杨邨人等人从武汉回到北四川路，在此开办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与此同时，茅盾于8月下旬从庐山回到上海秘密住进景云里；10月上旬和下旬，鲁迅、郭沫若分别从南方回到北四川路底，开展普罗文学活动。1928年2月，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创办太阳社，活动在这一带的郁达夫、洪灵菲、戴平万、王任叔、楼适夷和股夫等人先后加入，形成了一支由两个党小组、近20位共产党人组成的普罗文学文化生力军。

7月底，成仿吾借为黄埔军校采购军用品之机回到上海，9月赴日本动员一批年轻学子回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最早一批回来的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会同国内各地来到北四川路的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段可情、王学文等人，构成了后期创造社的中坚力量。1928年初创造社搬进北四川路，经过酝酿，“决定采取两道防线，一方面新发刊理论性的刊物《文化批判》，宣传马列主义的学说，战斗在第一线。《创造月刊》则利用历史关系，仍保持文学刊物的特色，将重点转到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创刊号出版，《卷头语》写得豪情满怀，“革命文学”的号角就此吹响。同日，停刊半年的《创造月刊》出版，郭沫若在此发表《英雄树》，文章认为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号召进步文化工作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1月15日，冯乃超在创造社《文化批评》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分析了当时最尖锐的5个作家的创作情况，说鲁迅的创作“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之后两个星期，新出版的《创造月刊》刊载了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3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发表了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这些文章都对鲁迅创作表达了同冯乃超类似的观点。

为回应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批评，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醉眼”中的朦胧》，拉开“革命文学”论争的帷幕。接着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钱杏邨等人以《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期刊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措词严厉的文章。鲁迅则以《语丝》为阵地，发表了《文艺与革命》《通信（并Y的来信）》和《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应。“革命文学”倡导者阵营与鲁迅之间这场论争在文学界掀起了滔滔巨浪。鲁迅开始大量购买和翻译马列文论，逐渐修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之后扛起了引领左翼文学文化发展的大旗。这年7月茅盾去日本，《蚀》三部曲出版后引来了进步文学阵营的一些批评意见。7月16日，茅盾在日本撰写《从勃朗到东京》，对这部作品“略加声辩”，再度引来一些批评声音，其中傅克兴、钱杏邨等人认为茅盾的写作立场在倒退。次年5月，茅盾发表《读（倪焕之）》一文，希望批评者不要曲解作品本意。

1928年3月与6月，同在上海的梁实秋在新创刊的《新月》上发表《（新月）的态度》和《文学与革命》两文。前文认为思想言论应有充分自由，遵守健康和尊严两大原则；后文认为文学是个人的，没有阶级分别，“革命文学”的概念是不成立的。针对梁实秋的观点，彭康和冯乃超分别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什么是“健康”和“尊严”》《冷静的头脑——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给予批驳。前者批评梁实秋所标榜的“健康”和“尊严”原则，实际上要扼杀言论自由，替统治阶级说话；后者批评梁实秋是以人性论否认阶级论，是以天才论反对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装着绅士面孔对“革命文学”的一种谩骂。

1928年初在北四川路上开展的这场“革命文学”论争，历时两年之久，余绪一直延伸到1932年下半年。不仅旗鼓相当的“革命文学”倡导者阵营和《语丝》派阵营发表了意见，很多局外文化学者、无政府主义者也谈了各自的立场观点，使“革命文学”影响在上海乃至全国迅速开展起来。这场文学论争如一声春雷，给暮色沉闷的文化界开辟了一块“革命文学”的根据地，在北四川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左翼文化舆论场，就连张资平这样擅写情爱小说的作家也纷纷“转向”，林语堂在此出版了《剪拂集》。大江、水沫、南强和春潮等进步出版机构纷纷在此成立，左翼期刊和新兴社会科学著作不断涌现，普罗文学异军突起，普罗思潮在北四川路形成滔滔之势。

尽管处在租界和半租界内，国民党对左翼文化的管理存在缝隙，但白色恐怖仍然十分残酷。1928年在北四川路上创刊的《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我们月刊》都不超过7期就被封，《流沙》《畸形》《时代文艺》《日出》等普罗文学文化期刊存在时间也不长，但这些努力却使普罗文化思想在文化界扎下根基，加上在这里创办的大江、南强、水沫、乐群等书店大量出版新兴社会科学著作和普罗文学作品，这些纸质图书的传播使普罗文学文化思潮传向了全中国。

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和我们社的晓山书店相继被国民党查封，加上之前被封的春野书店，使得原先集聚在这些出版机构下的左翼文化人发生分离。白薇、沈起予等人因生计问题离开北四川路，入党之后的彭康、李初梨等人则转向了“实际的地下斗争”。另一方面，柔石、冯雪峰、沙汀、石凌鹤、安娥等一批后起左翼文化骨干先后来到北四川路，使这里左翼文化思潮得到进一步巩固壮大。

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领导。1928年5月江苏省委宣传部成立了文化党团，7月成立文化工作者支部，其骨干大多是活跃在北四川路上的普罗文化人。

1928年12月底，受文化党团委托，钱杏邨、冯乃超邀请张申府等人在横浜桥附近广肇公学发起成立“中国著作家协会”。此协会参与者众多，后因其成分复杂没能更好发挥作用，但这是中共领导文化战线的一次有益尝试。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10月中央文委成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局面。

1929年初中华艺术大学搬迁到寰安路233号，这是我党领导的一所民办大学，学生大都是大革命失败后集在上海的进步文艺青年，“在教授和教员之中，几乎包容了当时所有最著名的左翼文化名人，如彭康、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沈起予、华汉等同志均在该校担任教学工作”。中华艺大的教学实践很快成为这里左翼文化活动的中枢，使北四川路融汇成了一个影响全国的左翼文化中心。

1929年下半年，许幸之、沈叶沅、石凌鹤等人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使上海左翼文艺思潮开始由初期的文学领域逐渐向左翼戏剧、美术领域渗透。这年6月艺术剧社在永安里成立，在党领导之下，“公然打起了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艺术剧社的文艺骨干都是原创造社社员和上海艺大学生，他们在这里大力开展左翼戏剧实践，于1930年春举办了引人注目的公演，创办《艺术》《沙龙》，点燃了左翼戏剧发展的星星之火，直接转到上海和中国戏剧的发展趋势。

许幸之是1929年下半年应邀回国出任中华艺大西画系主任的。1930年2月24日，他和沈叶沅、王一樵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发起成立“时代美术社”，标榜“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次打出了普罗美术的旗号。时代美术社组织漫画会和苏联革命美术图片展，开展了多项左翼美术活动，犁开了中国左翼美术事业发展的处女地。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左联是文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他广泛地团结了上海文化界思想最激进的一批文化人影响深远。左联成立前后，其编辑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产生了较大影响。左联之后，文委继续组织成立了社联、美联、剧联和文总，形成了统一的左翼文化阵营。尤其是美联和剧联，其机关设在北四川路上。左联联手鲁迅一直住在北四川路底，加上左联成立前后冯雪峰、柔石、林伯修、郑伯奇、田汉和其后的丁玲、周扬等人在这里的文化活动，使这里的左翼文化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九鼎鹤声。

三



左联“五烈士”

北四川路左翼文化运动的活跃，引来国民党更加严酷的打压。基于艺术剧社1930年3月22日在上海演艺馆公演产生的巨大影响，国民党于4月28日出动军警对艺术剧社进行查封。5月24日，国民党又出动大批军警查封了中华艺术大学，这里的左翼文化运动被迫全部转入地下。1931年1月17至18日，经常生活与活动在北四川路上的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先后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惨遭杀害，这是左联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左联“五烈士”事件使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损失惨重，间接导致李初梨、王任叔等左联盟员被捕，许峻、魏金枝、马宁先后被迫离开上海，杜衡、戴望舒等人不再参与左联活动，周毓英、叶灵凤因参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被左联开除。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在党的领导下，左联于血泊中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1931年2月，冯雪峰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上任就同鲁迅商量编辑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此刊于4月20日编定，7月出版，使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产生了国际性影响。与此同时，左联着手调整策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堡垒战”。之后北四川路先后迎来了楼适夷、艾芜、叶以群、周文、胡风等左联骨干，左联机关也转移到北四川路，这里的左翼文化迎来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新局面。因为秘密盟员宣侠夫的资助，1931年秋天，左联在北四川路旁创办了湖风书局、《北斗》和机关刊《文学导报》。这些出版机构和刊物的运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左联在北四川路创办机关刊《十字街头》，鲁迅发表的《“友邦惊诧”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等文影响很大。

在文学发展的同时，左翼戏剧、美术也在北四川路艰苦环境下向前推进。1931年1月初在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兴业坊成立的剧联，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运作艰难，但仍极力在高校和工人之间开展左翼戏剧活动，取得了好成绩。另一方面，1931年初许幸之离开上海，江湾路“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扛起了左翼美术旗帜。1931年夏，鲁迅在长春路开设现代木刻讲习班，从这时起成为左翼美术运动的实际领导人。鲁迅不仅自己大量自费出版左翼画集，多次在这里举办木刻版画展，还屡次应邀到公园坊里的野风画会做演讲，使中国的左翼美术活动成就坚实丰满。



原上草 萧殷书